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在向阳湖难忘的日子
牛棚日记
向阳日记
一莫须有一的一五一六——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忆干校 怀孟超
忆沈从文先生
“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旧梦重温时

湖北文史资料

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史料专辑

一九九九年第二期(总第三十九期)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0202947

K296.1

12.2

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史料专辑

《湖北文史资料》总第五十九辑

《咸宁文史资料》第一辑



201029476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咸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23456789

1999.5

湖 北 文 史 资 料 (季刊)

1999年第2辑(总第59辑)

主办: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湖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湖北省政协印制室

发行:《湖北文史资料》发行部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1999年5月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字数:12.6千字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3285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67/K

定价:6.50元

目 录

“五 七” 干 校 生 活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李晓祥(1)
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	萧 乾(5)
实话实说话“干校”	郝孚逸(12)
牛棚日记(节选)	陈白尘(19)
向阳日记(节选)	张光年(29)
子校劳动的回忆	韦君宜(36)
“莫须有”的“五一六”	洁 泯(39)
干校挨斗记	阎 纲(43)
向阳湖点滴	顾学颢(45)
重访文化部“五七”干校记感	张初考(55)
一片冰心在向阳	李城外(58)
冯雪峰与我同台讲用	文洁若(61)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陈早春(68)
忆子校 怀孟超	楼适夷(75)
向阳湖旧事	鲁 原(78)
忆沈从文先生	张学琦(83)
侯金镜在向阳湖	何 锐(87)
记王子野两次死里逃生	张惠卿(90)

郭小川写《杨家大传》《楠竹歌》《花纹歌》

的前前后后	陈大银(94)
赵辛初的咸宁情	陈大银(100)
袁涌进先生在均县“五七”干校	刘永愉(106)
“五七”路上向阳花	杨静远(109)
“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	李城外(122)

向 阳 湖 文 化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向阳湖文化

开发提案的由来	李城外(126)
“城外旋风”	柯于明(130)
旧梦重温时	李 辉(133)
致李辉先生的一封信	李城外(154)

是有宽广的湖面，可以围垦造田。

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湖北省军区从所属单位抽调了 73 人，组建成了“五七”干校军宣队，接替原北京军区设在文化部的军宣队。其中师职 1 人，团职 7 人，科级 10 人，参谋干事 48 人，排以下干部 7 人。1970 年 6 月 2 日进驻干校，随即与文化部带队干部组织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徐光霄（原文化部副部长，驻北京）；副组长：李晓祥（第一副组长）、杨岩（原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行政）、聂鸣九（原文化部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机关）、常萍（原文化部办公室处级干部，主管运动）和刘青山（文化部一般干部）。下设办公室（9 人）、政工组（7 人，组长刘剑青）、专案组（人数记不清了）、生产组（16 人，组长田惠普）、基建组（15 人）、建筑材料组（15 人）、食堂（6 人）、直属单位（18 人）、中转站（18 人）、木工排（32 人）、汽车修配厂（22 人）和运输队、机耕队、医院、学校、幼儿园以及丹江口老弱病残休养所等。

“五七”战士又分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具体情况是：第一大队，包括文化部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计财司、联络司、教育司、政研室、群文司，以及红旗越剧团、勇进评剧团等；第二大队，包括北京图书馆、文物出版社、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第三大队，包括新华书店及北京发行所、中国印刷公司、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含“荣宝斋”）等；第四大队，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等；第五大队，包括中国电影公司、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科学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等。

建校初期，在武昌金口和乌龙泉设有家属连，还有两个连队分别驻汀泗烧砖瓦和驻双溪挖煤，另在鄂西北设有丹江分校。从 1971 年起，学员陆续调回北京。至 1973 年，大部分学员离校，1974 年 12 月 16 日，干校解散，合并到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天津静海团

思想改造、搞运动。工余时的大批判、忆苦思甜、搞讲用、访贫问苦、表决心等这些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是向阳湖文化人最不愿触及的痛心的回忆。

当时咸宁干校影响较大的一件事是深挖“五一六”分子。“五一六”的由来，据说是因为一些人冲击外交部和英代办（英国驻北京办事处）引起的，早在文化部下放前就开始搜集材料。干校各个连队都有所谓“五一六”分子，某幻灯厂的张秀文是受冲击最厉害的。校部对他还进行了大批判，但没有定性。因为省里有个讲话精神，叫“三不急于”：不急于定性，不急于戴帽，不急于作结论。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对所有下放的文化干部都没有作定性处理。因为历史审查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当时看了一部分人的档案，觉得牵涉面太广，有些甚至牵涉到中央领导同志，我们怎么定性呢？再说也没有钱去搞外调，所以下放干部都没有作历史审查。自我检查过关，渐渐解放出一批人，像赵辛初同志就是这样的。干校解散后，张秀文所在的连队连长曾给我写信，表示批张秀文自己有责任，思想有压力。我当时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这个责任应由干校校部来负。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

1973年8月，我被调去咸宁军分区主持工作，省军区决定由咸宁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连珍同志接替我在干校的职务，我于是随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王万声到国务院向当时的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汇报工作。之后，就回到咸宁军分区。临离开干校时，干校还开了欢送会。

（石雁飞 记录整理）

萧 乾

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

知识分子下基层体验生产劳动并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原是大好事，也是人人都会拥护的事。可惜那时这种好事却并非出于自愿，不是硬往下赶，就是用形势来逼。1958年右派下去固然是惩罚，但毕竟还只限于不够驯服的一部分知识分子。1969年9月的“五七”干校，强制面就更广了，几乎是全体，而用意也更为深远：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

在永定门上车的时候，我还没想得这么远。当时只不理解为什么偏偏在国庆前夕那么迫不及待地把大家赶下去。另外，对工宣队把我们移交给军宣队，我心里也有些嘀咕。到咸宁后不久，军宣队就一个个地反复动员，要“五七”战士们把留在城市里的家人，不分老少，统统接下来。那是个不祥的预兆。洁若自然就遵命回京把两个孩子接了来。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后，才知道原来有个“一号通令”。

然而在北京蜗居八年，饱经风霜，如今望到那朱红色的土壤，起伏有致的丘陵，望到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的鄂东南一带农村，胸襟还是为之开阔。

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庄。它位于去县城的大道上，全村又都姓胡，所以村名“过路胡”。大家分住在农民家里。虎皮石垒起的墙上虽然贴着些气势汹汹的标语，村里除了偶尔听到声鸡鸣犬吠，到处

都是一片宁静。

我和两个人同屋，其中一位是因拾粪有功被评为“老革命标兵”的清白人，另一个曾被控参加过特务组织。开头只觉得这位标兵很冷淡，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对住房安排大为光火。敢情，当时论身份，我们是天上地下，如今竟混到一起，难怪他会气愤。干校既然军管，自然全按部队编制。我们机关是大队下面一个连，下再设排和班。领导名单早由工宣队拟好，下来就公布了。我和浩若同连同排但不同班，最初的一年半，只能男女分住。

当晚，房东就喊闺女给打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由于口音不同，相互谈话多少要打点折扣，可那份纯朴热情跟冀东的农民毫无二致。又能同老乡一道生活了，我从心坎上感到欣悦。

很快就发现，这村庄离铁路虽然只有五公里，却真够得上一穷二白。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作，秋收后工分算下来，一家除了口粮，简直拿不到什么现钱。没有电，家家户户晚上都点个小碟儿做的油灯。连几岁的娃娃也要牵根麻绳放水牯，似乎也没有看见提书包去上学的。孩子们对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任何东西，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样表示浓厚兴趣。全家大小都围了我那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看，既好奇，又羡慕。

村里有个风俗，死了人不马上埋，尸首停在敞开的棺材里，乡亲们通宵达旦地在旁守着。到后第三天晚上，房东说他的一位叔叔死了，同我商量可不可以把收音机带去，给守灵的乡亲们解解闷，我当然去了。一间黑洞洞的祠堂般的大屋子里坐满了人。我打开收音机，把它摆在掀起的棺盖上。守灵的老乡们一边吧嗒着烟袋锅子一边听，他们开心，似乎也慰藉了死者的幽灵。

原以为就这么同老乡住下去了，不久才知道，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下来首项任务就是搞基建，计划盖一大片住房，做永不回城的准备。

工地距过路胡有六七里，在滨湖的高坡上，房子盖齐了，下一

步就围湖造田了。

因此，每天早饭后我们就排队去工地。头几个月差不多成天都同砖瓦水泥打交道。湖还没围起，砖依然能从水路运到湖边，然后卸下来，用大车拉到工地上。

卸砖用的夹子，一夹就四块，递砖是排成一字长蛇阵，挨个儿往下传。年轻力壮的干起来从容不迫，年老体弱的难免就气喘吁吁。活儿往往按政治条件来分配，像我那样的摘帽“右派”以及其他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自然比革命群众还得多干些。遇到运砖瓦木料的船半夜才到达湖边，连长照例就站在门外，喊名字。喊到的即便已经入睡或是生点小病，也得乖乖爬起来去当差。湖北雨水多，湖边路窄泥泞。已经干了一天活再爬起来，有时真吃不消。一次排长派我下河捞泥，那是特壮劳力才能胜任的重活。浩若马上以我没带水田靴为由，替我搪住了，事后她还在会上挨了批。

有一天派我去大队部仓库领油毡。一看，管仓库的是一本大型外文字典的编著者。他因患癌症，锯掉了右腿，竟然也得下来。看他老远拿着钥匙一拐一拐地走来，我大吃一惊。每逢我干得吃力而要发牢骚时，就用他来鞭策自己。

房子由北往南盖，按平方米计算的建筑费，越降越低。起初全用砖，后改为一半用土坯，最后索性统统用土坯盖了——土话叫作“干打垒”。据说可以用“干打垒”盖几层楼房。房子随盖随往里搬人。直到老弱病残搬到另一个地区后，浩若和我才分到尽南头那排中的一间，桐儿也搬进来，我们三口团聚，又算是有了个家。

人们对太阳的感情因时令而异。寒冬时喜欢，酷暑时怕。从没听说过谁怕月亮。嫦娥的神话多美！人们还喜欢用圆月象征家庭团圆。因为那时军宣队就会半夜里忽然吹哨“拉练”。拉练是正规部队里为了战备而进行的一种特殊训练。躺在被窝里的战士听到哨声，要在几分钟之内整装跑步到操场，站好队形。走“五七”道路的干部，在军宣队管理下，不分年龄，一概也得经受这种特殊训练。

我往往是最后一个站上队的，一边看齐一边还在系鞋带。所以走起“五七”道路，人反常了。盼天黑，怕月圆：月亮一圆，就恐慌起来，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起的哨子。

下来之后，我们两个孩子的发展大不相同。儿子还在小学，先在咸宁住宿，继续读书，偶尔乘大卡车回到连里，和父母共度周末。只比他大一岁九个月的姐姐，只因为已上了初中，下火车的第二天，就被编入了劳动大军。

荔子思想单纯，素性好强。自从亲眼看到家被抄，父亲挨斗之后，她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狠抓政治。首先就是要学为革命奋不顾身的雷锋和王杰。连里什么活儿重，抢什么干。连里为了拉电线，在湖中竖水泥电杆柱子的时候，这个刚十四五岁的姑娘竟然成天泡在冰凉的湖水里，同“五七”战上一道死命地干，下工后，旁人换洗干净休息了，她却又去侍候连里一位绰号“圣人”的一家数口。“圣人”难得找到这么个小女仆，就贴大字报赞扬她是“活雷锋”。

“圣人”是位国学家，年轻时熟读诗书，生平最得意是几首歌颂大炼钢铁吃食堂的打油诗，他又是全连背诵“老三篇”的名手。他个子高大，嗓音宏亮，背时抑扬顿挫，表情生动，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一下子又像位活张思德，一下子又像是老愚公再世。“圣人”不但擅长舞文弄墨，还手巧心细，精于修理。下来之前他早有准备，还特置了一套修理工具。初到咸宁，听说军宣队首长的表不走了，他赶忙把活计张罗到手，连夜在油灯下给修好，又亲自捧到连部。于是，当我们风里雨里趟着沼泽地，赤脚下稻田时，连部却分配他坐在宿舍旁的一间草棚里，专管修理。要是连里有头有脸的人的手电筒什么的坏了，不用催促，他会马上给修好。一般“五七”战上送来的，就要看“圣人”的兴致了。

小荔自从听到这位“圣人”朗诵“老三篇”，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主动搬去和“圣人”的几位千金同住一屋，为他们洗洗涮涮。住在隔壁的几个女干部愤愤不平地对洁若说：“你的女儿太

老实，白天劳动，下工后还要为那么多人洗衣到深夜，身体要拖垮的呀！”有一次，洁若正在吃晚饭，旧领导班子的一个女党员来找她说：“这几个女孩子真不像话，我刚刚看见萧荔在塘里给他们洗衣刷鞋，他们自己吃饱了，也不去替换一下，让她回来吃饭，还在那里嘻嘻哈哈！”

原来包括这位女党员的女儿在内的其他几个女孩子也找到了窍门，都来利用小荔的劳动力了，但女党员作为“走资派”被揪斗了几年，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敢管。“圣人”告诉小荔，学雷锋贵在持久和彻底，不可听了流言蜚语就有所松懈。我们那个苦行僧的女儿听了，服务得就更周到了。

桐儿却绝不认为只因为父母在“文革”中被揪斗，就该由他来赎罪。他小学毕业时，连队办的向阳中学开始正规化了，所以他几乎没耽误功课。他写的一篇关于中国民歌的长文，受到国语老师的赞赏，还跟着我学起英文来。他没当成长白山的猎手，却成为那一带的捕蛇能手。三年里，他足捕了两百多条蛇，并特别喜欢徒手去捉毒蛇。一回，他给眼镜蛇咬破了手指，偷偷去医务室打针吃药才好。他有时晚间提了几只牛蛙回屋，于是，一家三口就打起牙祭。

五个连几百口子住在一个山头上，吃水是大问题。幸好坡下就是湖水，尽管那是几十头水牯的浴池，也得把水绞上来食用。这样，就请来一位柴油机师傅，他需要个助手。试了几个人都没入选，他单单看中了我这个笨货。于是，我由班上抽出来，当上这个美差。

以前，早饭后一听连长吹口哨，我也像旁人一样，就扛了农具去站队。然后由连长带头喊上几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随大队向地里走去。如今，我却站在湖边柴油机席棚外，看着大队走过。

有时，大队过去后不久，就见连长扛着鱼网到湖边来打鱼了，随身还带着连里的一位女干部。这位凭出身和武斗本事由基层升成领导的连长，最喜打鱼。由连里出一大笔钱买了张鱼网，供他散心。打到了他可以改善生活，打不到也别有一番乐趣。

对我，那不啻是一纸判决书。

那以后，要我改值夜班，那阵子连里正死了人，活若说高低也要我活着回去。于是，她白天下地，晚上还经常帮我值班。

这时，一位从延安来的诗人以老干部身份替大家求情了。这下子军宣队领导暴跳如雷，认为他抗拒劳动，是大逆不道，就死命找他的碴儿。“五一”节他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内有“身在咸宁，心在北京”之句，显然是在表达他多么想念党中央。这下辫子给军宣队抓住了，便批判他不安心劳动。后来北京调他回去，调令也被扣住。这位可敬的诗人始终也没有回首都。他一肚子委屈，躺在床上喝闷酒抽烟，燃着了被头。套用托尔斯泰的话：人诞生时的情况大致都差不多，死法可就千变万化了——尤其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

诗人就这么饮恨而死。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在当年的向阳湖畔为他竖立一座诗碑，在表彰这位有恻隐之心的共产党员的同时，也纪念那段难忘的日子。

连。我所在的二连由文化部的文物局、教育局、政策研究室、对外文化联络司和群众文化办公室等部门的同志组成。连下设排，排下设班；班按部门划分，人多的设两个班，人少的一个班。二连共分十个班，外加一个炊事班。干校的二十六个连中，除几个连分别担任烧砖，烧石灰，挖煤外，绝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每个班都有具体的劳动任务和生产指标。我是连里的文书，有些杂事，不在班里劳动，但也经常去田里干活，主要是给各班送开水和参加各种农活。

在下干校之前，首都石景山钢铁厂的部分工人和北京军区第六十五军的部分官兵，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文化部。下干校时，工宣队没有下，军宣队从干校的开始一直坚持到它的结束。本来，干部下农村劳动，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我们在干校除请附近的生产队长指导农业生产外，和广大贫下中农接触不多。整个农业劳动都由军宣队指挥和安排，军宣队强调劳动是主课，每月除放假一天外，主要时间都用在劳动上，首先是修渠造田。围垦后的湖区，还是水汪汪的一片。水底下的淤泥，脚踩下去就往下陷，有的地方还能陷到腰部。有的女同志不小心陷下去，几乎没到颈部，几个男同志要花很大力气才把她拖上来。1970年春节一过，我们就开始下田了。当时天冷水也冷，双腿泡在水里，两腿踏着淤泥，一锹一锹地挖，平田、修埂、挖渠，直到搞成一块块一亩见方的水稻田。与此同时，一部分人员选种、育秧，以后便是插秧、田间管理，最后又是割稻、打场……第一年我们种单季中稻，看起来长势不错，生产队长说可能同他们的收成差不多，但最后打下来，每亩平均三百多斤，只有生产队收成的一半。

1970年冬，北京召开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个干校的负责人，文化部“五七”干校也参加了。会上介绍了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的经验，这个经验的基本点就是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做到“四自给”，即粮、油、肉、菜四自给。精神一传达，我们也就积极行动起来了。这时，军宣队已

由六十五军换成湖北省军区了。军宣队根据湖北省大力推广双季稻的做法,决定我们也种双季稻。1971年,强调早稻不插“五一”秧,晚稻不插“八一”秧,抢插抢种,从年初一直忙到年尾。特别是盛夏的七月,是双抢季节,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更是紧张得无以复加。大家起早贪黑的干,真可谓早上披星下田,晚上戴月收工,饭都送到田头去吃。由于要做到“四自给”,适当加了些人力搞旱地作业和养猪、种菜,大田的任务就变得更重了。一年下来,粮食收成并不比上年多,因为晚稻的收获比较少。但副业上去了,伙食有所改善,吃肉的次数比以前多了些。有的连队还养鸭子,到过年时,每人分到了一只红烧鸭。

我是1972年春离开干校的。在1971、1972年这两年中,我和大家一样,参加了农业劳动的全过程。虽然也有一些家在农村的同志,有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和一定的操作经验,但相当多的人是不懂得农业生产的,更没有过这样从早到晚一直在田里忙碌的经历,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说实在的,心里还是高兴的。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是“劳动惩罚”论者的初衷,他们的要求也不会是仅乎此而已的。

二

不知是从何时何地叫开的,不少地方的下放干部都把自己称作“五七”战士。“五七战士”不仅流大汗,忙于和天斗,和地斗,还要不断地和人斗,和自己斗,和头脑中的“私”字斗,这就是改造思想。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修正主义黑线”专政下的干部,都是“黑根子”、“黑苗子”,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不说,还总是“妄想变天”。那么,怎样来进行思想改造呢?劳动是一种改造,但光是劳动还不够,还要结合劳动批判错误思想,随时随地抓住各种问题,坚持以“大批判”开路。由于劳动任务重,加上又是硬指标,所以平时很少有时间安排学习。只有每天早上的“天天读”,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以后,用一小时时间,以班为单位围坐在

一起，朗读毛主席语录。双抢大忙的时候，天没亮就出工，来不及读，就在田间休息的时候读，或者在晚上补读。另外，在开会前或劳动出发前，也要选读几段毛主席语录。经常采用的学习方式，是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劳动中学习，在劳动中改造思想，主要也是通过讲用会的方式进行。因为要在艰苦的劳动中求得脱胎换骨，所以要特别注重劳动态度的转变，要求人人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讲用发言，要联系劳动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实际，特别是在遇到苦活、累活、脏活时，自己产生了什么错误思想，包括这种思想的一闪念，都要把它抓住，而且要说出来。要做到“亮私不怕丑”，这是能不能进行讲用和讲用得好的关键。在“亮私”以后，就是“斗私不怕痛”，要用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最后说明自己是怎样在行动上得到改正的。这样的讲用会，在班、排、连、大队和干校都开，层层选拔，树立不同层次的典型。

搞大批判，主要是斗“阶级敌人”，这方面的情况就不作详细介绍了。对下放干部的平时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本不属于大批判范围，也往往以大批判对之，在小会上批，或在大会上斗。有一位老同志，因为年老体弱，不能下田劳动，就被安排在住地干些零星活。一次，他奉命把打下的黄豆挑一挑，把坏豆子去掉。他极其认真地对待这项任务，尽管眼力不好，还是仔细地把每粒豆子都“检查”了一遍。为了把工作做细，他把豆子分做三摊子：好的，一般的和坏的。后来，在一次讲用会上他谈体会，说他怎样接受任务和怎样完成任务，其中说了一句我把黄豆“一分为三”。这下子惹了麻烦，送上了批判会，说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思想。有一位年纪不算小的女同志，患有几种慢性病，下干校时身边带了一些药。有一次，不知怎么被翻腾了出来。于是，在院子里放了一张小桌，把一些瓶瓶盒盒都摊在桌上，让这位女同志站在桌旁，低着头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的内容是说她贪生怕死，奉行活命哲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老同志从城里

买了一些罐头，有时吃饭时就开一个，一些年轻人也就走过去你尝一口、我尝一筷，大家边吃边笑。结果，这件事又成了一种“新动向”，引来一场批判。批判者说这是用糖衣炮弹打人，腐蚀和毒害年轻干部。这类问题几乎随时可以抓到，而在批判时则无限上纲上线，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路线斗争问题，不是世界观问题就是阶级感情问题，单从词句上看是吓人的，但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所谓的“改造思想”，对思想并无什么帮助，不仅被批判者无动于衷，就是批判者也若无其事；可谓是批判时声色俱厉，批判后一笑了之。

三

干校的领导机构，是文化部“五七”干校筹建组，在军宣队的统一指导和具体组织下进行工作。筹建组下设生产组、政工组和后勤组等工作部门。我在1970年下半年，离开二连，被抽调到政工组负责宣传工作。我有几项日常工作：一是管干校的有线广播站。当时广播站有两个技术和管理人员，一个女广播员，每天早、中、晚进行三次广播，各连都装有高音喇叭。二是联系一所中学，这是我们自己办的学校，学生都是跟父母一起下放的子女，教师则由适合教学的干部担任。学校有校长，我主要是了解情况，配合做些思想工作，参加解决一些问题。三是一些临时的突击任务。比如，1971年夏天咸宁县搞一次游泳比赛，要求干校也组成一个小分队参加。我负责这个小分队的组建、训练以及参加比赛的全部工作。除上述工作外，我的任务主要是写东西，一般包括两方面：一是写典型材料；二是组织写作组，撰写文章。

所谓典型材料，主要是反映在劳动和思想改造中的心得体会以及经验交流中的总结材料，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我负责写的材料，主要是用于在全干校大会上交流或准备上报的材料，除个别的总结个人事迹的以外，大都是先进集体的材料，也就是当时认为搞得比较好的连队的材料。写的材料面较广，除几个农业连（包括二